

图·文·全·本

部级领导干部 历史文化讲座

史 鉴 卷

上册



国家图书馆 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C/46=3
:1(1)
2010

部級領導干部 歷史文化講座

国家图书馆 编

史 鑒 卷

上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图文全本·史鉴卷 / 国家图书馆编. —北京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13-4352-2

I . 部… II . 国… III . ①社会科学 - 干部教育 - 教材 ②中国 - 历史 - 干部教育 - 教材 IV . ①C②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0926 号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图文全本·史鉴卷

国家图书馆 编

责任编辑 郭又陵 耿素丽 王燕来 许海燕

特约编辑 白 勇

出版发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100034)

电 话 010-66136745 66175620 66126153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2.75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1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4352-2

定 价 79.80 元(上、下册)

序言

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为此，全党同志要按照十六大关于“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高度重视学习，切实加强学习，以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实践的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带头学习，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领导水平。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的学习，始终把学习作为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和加强学习。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胡锦涛同志指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中华民族有灿烂辉煌的历史，有悠久绵长的文化，这是维系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有继承，才有创新。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创造历史。领导干部应不断深入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化，拓宽人文视野，提高文化素养，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讲座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形式。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为部级领导干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受到部级领导干部的好评。希望今后坚持下去，不断丰富讲座内容，越办越好，有更多的领导干部参加学习。国家图书馆作为讲座的承办单位，将讲座内容经过提炼推敲，编录成集，供更多的人参阅，对于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收选的内容，也不一定尽善尽美，甚至亦或有不妥之处，应欢迎读者提出意见，以臻不断完善。

李春法

2003年2月27日

目录

上册

阎崇年	读史·治国·修身	(1)
李学勤	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21)
汤一介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	(43)
何芳川	文明与航海	(69)
刘海年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若干问题	(89)
吴良镛	总结历史，力解困境，再创辉煌 ——纵论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与发展	(117)
任继愈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	(149)
葛剑雄	移民与中国：从历史看未来	(169)
葛兆光	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	(205)
邓小南	宋代历史再认识	(221)
陈高华	元朝的兴衰及其历史启示	(243)

下 册

王天有	明代国家权力的运作	(257)
戴逸	论康雍乾盛世	(273)
金冲及	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297)
李文海	从民族沉沦到民族复兴	(323)
张海鹏	洋务活动及其现代的解释	(351)
唐浩明	曾国藩其人其事	(379)
王晓秋	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的比较	(403)
庞卓恒	从世界历史看文明兴衰规律	(435)
朱孝远	为什么欧洲最早进入近代社会	(475)



阎崇年

读史·治国·修身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议并创建第一个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和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倡议并主持第一至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天命汗》、《清朝皇帝列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正说清朝十二帝》、《袁崇焕传》、《明亡清兴60年》（上、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古都北京》（中、英、德、法文版）、《中国都市生活史》等29部。主编《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满学研究》（一至八辑）、《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等14部。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清十二帝疑案》（38讲）和《明亡清兴60年》（50讲），在北京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BTV—1）“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主讲《清宫疑案正解》（12讲），清史系列讲座共百讲。

《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

先后到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讲学。1989—1990年，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达姆斯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夏威夷大学等进行访问并演讲。最近应邀到美国、马来西亚进行学术交流。

我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读史·治国·修身”，相互探讨，听取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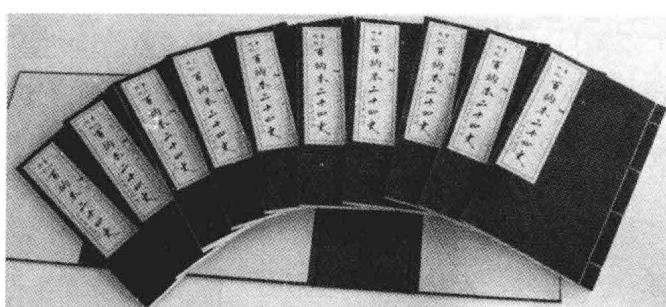
一、读史

我觉得，每个公务员都应当读一点历史，不管工作有多忙。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我理解，这句话的原意不是说历史科学以外的科学不重要，而是说历史科学重要。历史是先人的足迹，是亿万人经验与教训的记录。历史科学对于公务员来说，其重要性是：有助于提高资治能力，有助于陶冶人文素质，也有助于个人修身养性。

既然读史重要，那么怎样读史呢？俗话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读起呢？在“二十四史”中，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3000多年。第一个1000年，主要是商、周，《三字经》中“东西周、八百年”，再加上商，概数是千年。其后的2000年，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嬴政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而自称始皇帝，从此中国开始有了皇帝；到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废除帝制。这段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皇帝。我将这段历史称作中国皇朝历史。中国皇朝历史，总计为2132年。

这2132年的皇朝历史，有多少皇帝呢？有人统计共492位皇帝，有人统计共349位皇帝，康熙帝让他的大臣统计说211位皇帝（加上尔后8位，共219）。其统计数字之差异，主要是取样标准不同。这可以不管，我们重在思考这2132年皇朝的历史。

中国两千年皇朝历史，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段，前一段



《百衲本二十四史》书影

1000 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西安。其间政治中心经常东西摆动——秦在咸阳，西汉在长安（今西安），东汉在洛阳，唐在长安，北宋在汴梁（今开封）。后一段 1000 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北京。其间政治中心经常南北摆动——辽上京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菠萝城），金都先在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后在中都（今北京），明都先在金陵（今南京）、后在北京，清都先在沈阳、后在北京。从上述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中国两千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从而呈现出大“十”字形变动的特点。

就其后 1000 年来说，辽、金、元、明、清五朝，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内的民族融合。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洲，五朝中有四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明朝虽然是汉族人建立的，但朱元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结果又被“鞑虏”所替代。满族以“七大恨告天”的民族旗号起兵，又被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所推翻。

在后 1000 年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历史中，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第一个是元末明初，第二个是明末清初，第三个是清末民初。前一个元末明初关节点，离我们今天较远，后一个清末民初关节点离我们今天太近，我们今天都不去讨论；中间一个明末清初关节点离我们今天不远不近，所以我今天就其有关问题进行讨论。这个关节点，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前后变化整整 100 年。当时的中国用了 100 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 100 年的时间，最关键、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是明亡清兴这 60 年。解剖这段历史，对整个中国历史关节点的研究，特别是对我们治国，对我们政治经验的丰富，有很大的帮助。

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之，读史要考盛衰、知兴替，以史为鉴，达到至治。

二、治国

明朝自洪武元年（1368），到崇祯十七年（1644），16 位皇帝，276 年。

明朝为什么灭亡？清朝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整60年。清朝为什么兴起？明亡清兴历史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

清初一些学者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对明亡的原因做出多方面论述。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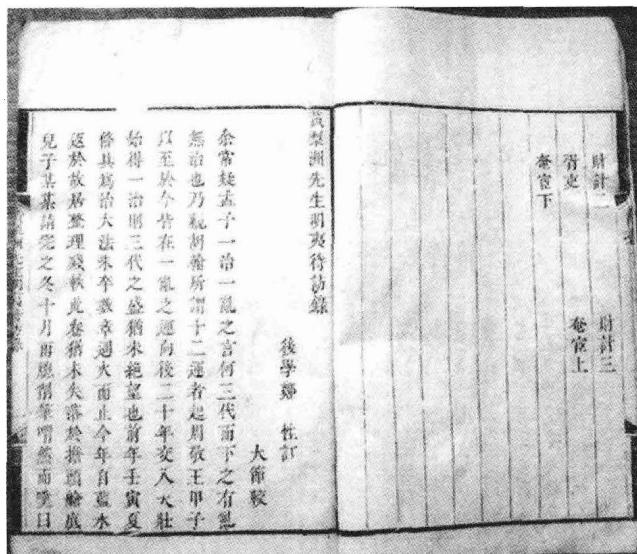
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明朝君主集权固然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也是君主高度集权啊！

有学者从明朝制度缺失分析其灭亡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缺乏宰相制，君主的无能和派系的争执这两大古老的难题，在明代越发难解了。”（司徒琳《南明史·引言》）就是说，“洪武十三年罢丞相”（《明史·职官志一》），大学士地位降低，正五品，侍左右，备顾问。然而，崇祯时大学士官一品，也不能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

还有学者从吏治败坏去探究其原因。明朝吏治腐败，各代都有。看来明朝灭亡原因，仍需进行具体分析。

明朝覆亡，原因复杂。从历史序列来说，有长、中、短三个层面——长者，要从洪武说起，明太祖朱元璋的制度、政策是双刃剑，它一面巩固了明朝社会秩序，另一面埋下了后世社会弊端；中者，要从万历说起，万历帝的怠政、泰昌帝的短命、天启帝的阉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短者，要从崇祯说起，崇祯帝想做“中兴”之主，却成了“亡国”之君。

作为历史明鉴来说，明朝覆亡的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吏治、制度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每个问题都可以写专题论文，合起来可以写一部百万字的大书。现在大家非常忙，谁有



《明夷待访录》书影



老子画像

工夫看探讨明亡原因的百万字大书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明化。把复杂的问题简明为“一”。《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得一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我借用《老子》的“一”，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一个切入点分析明朝覆亡、清朝兴起的原因，虽有以偏概全之嫌，却可以简括为一个“分”字与一个“合”字。分与合是对立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是“分”——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朝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合”

——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

明朝灭亡的一个直接的、也是基本的原因，就是“民族分”。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子，推翻蒙古孛儿只斤氏（博尔济吉特氏）贵族的统治，建立明朝。明朝以“驱除鞑虏”起家，又被“鞑虏”取代。可见明朝的民族关系出了问题，特别是北方的民族关系出了问题。明朝北方的民族问题，前期主要是蒙古，后期主要是满洲。

先说满洲。明朝对女真——满洲的政策是“分”，就是使女真诸部“各相雄长，不相归一”（《明经世文编·杨宗伯奏疏》）。具体说来，就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于是，明朝对女真各部，支持一部，打击另一部，拉此打彼，分而治之。

满洲先人女真原来是明朝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努尔哈赤先人是明朝建州左卫的朝廷命官，努尔哈赤也是朝廷的命官。他曾先后八次骑着马到北京，每次往返跋涉4000里，向万历帝朝贡。他说自己是为大明“忠顺看边”，就是忠心顺服地看守边疆。那么努尔哈赤怎么会成为明朝帝国大厦的纵火者，并成明朝的敌人呢？直接原因是明朝对女真政策出了问题，万历皇

帝、李成梁总兵在古勒寨之战中，误杀了一人，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结果呢？“潘多拉之盒”打开了，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挑战明朝，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谚语云：“女真满万，天下无敌！”这话说得夸大了一点。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建立满洲八旗，大约有6万人。女真一满洲满了6万，就成为一种很大的军事力量。要是满洲分，而蒙古不分，明朝和蒙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努尔哈赤，那么满洲的难题也可能有解；但明朝又把蒙古分了，蒙古原来是明朝自己的人，却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次说蒙古。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明朝为防止北元蒙古贵族复辟，采取许多措施：一是天子守边，二是修筑长城，三是设立九边，四是举兵北征——洪武年间，五次北征；朱棣期间，七次北征。永乐皇帝甚至死在北征蒙古的榆木川地方。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入塞，在土木堡之役俘虏明英宗皇帝。嘉靖年间，蒙古俺答兵薄京师，为此北京修建外城。“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明史·鞑靼传》）

明以“西靖而东自宁，虎（林丹汗）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明史·鞑靼传》）。对蒙古实行“抚赏”政策。但林丹汗“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明史·鞑靼传》）。漠南蒙古闹灾，明朝不予“市米”，袁崇焕主张以粮食换马匹，朝廷以袁崇焕“市米资盜”等罪，将其处死。

清则与明相反，皇太极对受



袁崇焕雕像

灾蒙古进行救济。清对蒙古采取赈济、联姻、编旗、重教、封赏等一系列措施，蒙古察哈尔林丹汗死，诸部皆归于清。《明史·鞑靼传》评论道：“明未亡，而插（察哈尔林丹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在对待蒙古、满洲关系上，明朝先是“以东夷制北虏”，后又“以北虏制东夷”。结果是“东夷”与“北虏”联合，就是满洲与蒙古联合，出现满蒙联盟的局面——满蒙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明朝。

我们再回顾一下满洲的历史。清朝兴起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合。首先是建州女真合，接着是海西女真合，再是东海女真合、黑龙江女真合，合成满洲。而且，满洲同蒙古联盟，同汉军联盟，同东北达斡尔、锡伯、赫哲、鄂伦春、索伦（鄂温克）等少数民族合，组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只拳头合起来打明朝；显然，明朝就招架不住了。

明亡清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演变的历史，就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不断地在斗争中融合、发展、壮大的历史。当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时，国家就强盛，反之就衰弱。现在我国有 56 个民族，民族协和，共同前进，我们国家将来一定会更强大。所以，只有民族融合，才能中华强盛。

官民分，明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原的民变，其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自然灾害加深与激化了官民的矛盾。官民矛盾，试举三例。

卖官鬻爵。崇祯朝吏部尚书周应秋，公然按官职大小，秤官索价，卖官鬻爵。他“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官员花钱买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敛财还债。吏、兵二部，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这话出自崇祯皇帝之口，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无地立锥。官员贪，百姓呢？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有的地方田地“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简直就是“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汪价《中州杂俎》卷一），就剩下长满青草的道路，还没有归于王孙贵族之家，剩下的已经没有寸土属于百姓了。于是出现这样一幅黑暗图画：“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

饥寒切身，乱之生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一〇本）这样，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

灾荒严重。赤地千里，危机加剧。“亢旱四载，颗粒无收，饥馑存臻，胁从弥众。”（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〇）饥民吃泥土、吃雁粪，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刚死而被割，儿刚死而被食。史料记载：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马懋才备疏大饥》，载《明季北略》卷五）

相反，后金—清处在上升时期，虽也有官民矛盾，但并不突出。后金进入辽河流域腹地后，发布“计丁授田”令，部民按丁分给土地。后金—清用八旗制度——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女真—满洲人编制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唯以多得财物为愿”（李民宾《建州闻见录》）。这同明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地立锥”，明军“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熊襄愍公集》卷三）的社会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官逼钱粮。财政紧缺，加紧搜刮。下面讲三个故事。

明大学士、首辅刘宇亮自请往前线督察，抵抗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他率军队过安平，得报清军将到，吓得面无人色，急往晋州（今河北晋县）躲避。知州陈宏绪闭门不纳，士民也歃血宣誓不让刘宇亮军进城。刘宇亮大怒，传令开城门，否则军法从事。陈宏绪也传话给大学士刘宇亮说：“督师之来，以御敌也！今敌且至，奈何避之？刍粮不继，责有司；欲入城，不敢

闻命！”（《明史·刘宇亮传》）知州陈宏绪将避敌逃生的大学士、宰相刘宇亮拒之城外。刘宇亮恼羞成怒，上疏弹劾陈宏绪。“州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者千计。”（《明史·刘宇亮传》）

李清路过山东恩县，亲见官吏“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到崇祯帝即位之年（1627年），“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鹿樵纪闻》卷下）。饥民被迫鸠众墨面，闯入澄城县衙，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与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孟子》说：“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如果上不能养父母，中不能养自己，下不能养妻子，这样的社会必然动荡不安。

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现“官逼民反”现象。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百姓被逼，铤而走险。崇祯皇帝在大灾之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民族分，加深官民分；官民分，又加深民族分。它们的背后，则是君臣分。

君臣分，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农民起义与满洲兴起是外在的因素，执政集团内部的君臣分，则是其内在的因素。

明朝执政集团有两个肿瘤：一是宦官专权，二是朋党之争。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宦官专横，朋党争吵。崇祯帝上台后，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仅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来又信任太监，派太监监军，使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宦官问题重演。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君与臣分，君臣之间或明或暗地搏杀，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核心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朱明江山的基础。这就使得如清文馆降清汉官所说的：“在事的好官，也作不了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明朝也有能臣，辽东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他们都没有好下场。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孙承宗被逼辞职还乡，壮烈而死，袁